

“史学原理”：一部未完成的大书^{*}

顾晓伟

1938年初,柯林武德遭受多次中风,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重的情况下开始撰写思想《自传》,以此整理尚未发表的研究内容。对于终身用笔思考的人来说,柯林武德非常坚定地认为:“任何疾病都不会妨碍我思想和写作的能力,也不会妨碍我思想和写作的质量。当我感到不适,写下一些哲学断想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停笔之前我会忘了所有病痛。”^①然而,长时间的过度工作只会加重病情。写完《自传》之后,柯林武德暂时离开讲台,从英格兰的默西河出发,前往荷属东印度航行,希望缓解日渐恶化的病情。^②在旅行期间,从1938年10月24日至11月13日,柯林武德在阿尔克诺俄斯(Alcinous)号轮船上完成了《形而上学论》(起初命名为《形而上学导论》)一书的初稿,尝试总结自《哲学方法论》之后开始思考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且其文体像《自传》一样,保持着激昂的战斗精神。当时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一书中声称“形而上学”都是一些无意义的问题,柯林武德作为牛津大学温佛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深感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他在文中激烈地抨击了牛津实在论者解决人类文明问题的无能,重申了形而上学对欧洲文明的重要性。

1939年2月9日,柯林武德开始写作《史学原理》一书,并草拟了写作大纲,虽说他生前只完成了写作大纲第一部分的前三章,但他写给考古学朋友辛普森(F. G. Simpson)的信件中明确表示此书是他的毕生之作,“我已经在爪哇写了4万字,这是一本我一生都在准备的书籍。假如能够完成,我也就没有遗憾了”。^③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欧洲局势的突变,柯林武德转向了更为紧迫的《新利维坦》一书的写作,以此总结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思考。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其实早在1938年,柯林武德在《自传》中就预见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他看来,一战爆发是因为局势失去了控制,最终签订和平条约也只是因为一方打不动了,而不是控制了局势。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欧洲精神在控制物体和物力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面对人类存在和人的精神,却表现得无能为力”。^④战争是自然科学的空前胜利,但自然科学的力量正在把欧洲变成人面兽心的野蛮之地,这无疑是人类理性的空前耻辱。

作为专业的思想家,从一战之后,柯林武德用了近20年时间来思考如何建立一门人文科学,希望从中学到处理人类事务的技巧,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知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现实的行动者,柯林武德同样意识到自己要战斗起来,不仅要与自己的身体疾病做斗争,而且要与欧洲的心灵疾病做战斗。同样从一战之后,柯林武德就在思考道德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广义的历史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项目编号: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② Fred Inglis, *History Man: The Life of R. G. Collingw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47-287.

③ W. J.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443-444.

④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86-87页。

哲学(历史的形而上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实在论者的战斗就意味着要反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哲学只是纯粹理论的科学,而与人类的实际行动本身毫无关系。在柯林武德看来,知识论与形而上学并不矛盾,“哲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主体方面而言,就是一个认识论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客体方面而言,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但是这种说法,由于提示他的工作的认识论部分和形而上学部分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将是危险的,而且它也会是一个错误。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的研究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研究分别开来”。^①重建历史学与哲学的融通关系,同时也就意味着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反对那种科学玩具似的哲学,而认同作为武器的哲学。柯林武德用生命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即《新利维坦》(1942年1月16日),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把利剑,直刺欧洲野蛮主义的心脏。

几乎是在完成《新利维坦》写作的同时,柯林武德被中风彻底击倒了,身体左边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他与妻子在德国空袭伦敦而造成交通不便的情形下,极为艰难地从牛津返回他父亲生前在康尼斯顿(Coniston)的居所。1943年1月9日,在二战的炮火声中,柯林武德悄然离世,安葬于他父亲的身边,享年仅53岁。

柯林武德的生命从此画上了句号,但他给此后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崇高的思想遗产。1939年10月18日和19日,柯林武德在写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信件中提到了他的出版计划,打算把以前发表的一些著作编成一套系统的文集。这套文集分成三类:哲学论集、哲学的原理和观念史研究。第一类包括《哲学方法论》(1933)和《形而上学论》(1940);第二类包括《艺术原理》(1938)、《史学原理》(1999);第三类包括《自然的观念》(1945)和《历史的观念》(1946,增补本1993)。显然,柯林武德生前只出版了这一计划的1/2,剩下1/2的出版则由他的继承者所承担。由于各种原因和时代命运使然,他的毕生之作《史学原理》的手稿被掩藏了半个多世纪,1999年才由德雷和杜森编辑出版。假如柯林武德没有英年早逝,假如没有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史学原理》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英美的史学理论界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惜历史上并没有假如。

柯林武德去世后,手稿交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来编辑出版。“自然的观念”这份手稿并未做多少编辑就出版了,但是,“历史的观念”则做了大量的增补工作。诺克斯并未按照柯林武德的意愿来编辑出版“史学原理”,他给出的理由是健康原因导致了柯林武德未能完成原有的写作计划,单独出版显然是不成熟的。诺克斯只是将“史学原理”书稿中的“证据”和“自由”这两篇的内容编入了“历史的观念”,并增补了柯林武德就任温佛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的想象”)和提交给英国国家学术院的讲稿(“人性和人类历史”),连同柯林武德1936年写作的三篇“形而上学后论”,共同构成了《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后论”部分。

诺克斯爵士作为英国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显然把柯林武德塑造成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众所周知,黑格尔早在《世界历史的哲学》一书中就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由此,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的精神(思想)从东方向西方发展的历史。《历史的观念》同样可以看作一部“普世史”,世界史学的发展过程,从希腊罗马开始,随后经历基督教的洗礼和文艺复兴以来的辩证发展,最终在现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代西欧社会中壮大和成熟。只不过,柯林武德并没有像黑格尔思考历史过程那样,将东方世界作为“科学历史学”的开端,而是将开端聚焦在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史学,并没有触及印度和中国这样更远的东方史学。在柯林武德看来,近东地区的神权历史学和神话只是一种“准历史学”,真正的科学历史学是由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创立的。此外,基于“历史”一词的二重性含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聚焦在“历史客体”的过程上,常被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的形而上学,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则集中在“历史主体”的思维上,常被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历史学的知识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之“新”,就是他提出了“一切历史学都是思想的历史学”这一论题。

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演讲录”(1822)到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演讲录”(1936)的一百多年间,恰好是欧洲职业历史学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欧洲人擅长逻辑地思想,然而历史地思想,则是欧洲近代的发明。历史学对于整个知识体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历史学家从史学实践的层面来归纳和总结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1868)、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1889)和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而且,几乎与此同时,哲学家也开始从逻辑和概念的层面来介入“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一话题,就像康德对16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前提和条件进行“纯粹理性批判”一样,新康德主义者也试图对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科学的前提和条件进行“历史理性批判”,比如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1874)、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1883)、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1902)。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柯林武德无疑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的这一思想遗产。

随着二战后柯林武德研究的扩展,特别是1978年,柯林武德的女儿特蕾莎·史密斯(Teresa Smith)女士把柯林武德去世时留下的总共4000页左右的手稿存放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供读者查阅,促成了柯林武德研究的又一个高潮。荷兰学者杜森利用未刊手稿比对和评价了诺克斯版《历史的观念》的得失,增补了柯林武德在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历史哲学讲稿,于1993年出版了杜森版《历史的观念》,使得原先混杂的版本变得清晰起来。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史学原理》于1999年得以编辑出版,德雷和杜森为此撰写了长篇导论详细介绍《史学原理》的内容,并增补了柯林武德1933年至1939年的历史哲学论文和笔记。这两本著作的重新修订出版,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历史的观念》所增补的三篇历史哲学手稿,充分展现了柯林武德的新康德主义倾向,特别是在“历史哲学纲要”(1928)一文中,出于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敬意,柯林武德分别以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范畴来探究历史学的知识论问题。在这里,柯林武德首次提出了历史的观念性学说:“一切历史学都是思想的历史学。”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柯林武德对历史学的知识论的探讨,并没有像分析的历史哲学家那样,以此来割裂和拒斥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一个法则确实是逻辑法则,也就是说,是一个具有有效性的思想法则,而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法则,那它必定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逻辑和形而上学便是相同的……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把历史哲学简单地称为历史方法的科学、历史的方法论,那就是一种误解。它既是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又是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只有主观方法和客观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才是一门令人满意的科学。”^①在1936年写作的“历史哲学”(《历史的观念:导论》)一文中,柯林武德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将历史哲学区分为狭义的历史哲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第422页。

学和广义的历史哲学,前者是对历史学何以可能的探讨,后者则是从历史观点所构思的一套完整的哲学。在柯林武德看来,从康德到黑格尔,也许只是一步之遥。“史学原理”与“历史的观念”,也应该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

二

关于“史学原理”这部大书,柯林武德计划写作的主题包括三个部分:(1)单独说明历史学作为一门特殊科学最明显的特征;(2)历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3)作为思想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依次为本书的I、II、III部分。”就第一部分而言,柯林武德计划写作的主题包括四个章节:I.1、陈述并阐明证据的概念。这与证词的概念和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涵义形成对照。I.2、陈述并阐明行动(*res gestae* [活动事迹])的概念。这与过程或变化的概念以及伪历史的涵义形成对照。I.3、重演的概念。这与死去的过去和完全性的概念形成对照。I.4、历史学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排除其他心灵科学。”^①令人惋惜的是,柯林武德生前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前两章节的写作。如果我们对勘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的导论中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讨论,或许可以补充和重构“史学原理”的丰富内涵。“史学原理”的整个构思,一部分源自他的考古学经验,另一部分来自他的哲学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在导论中总结的历史学的四个准入性条件和标准,也可以看作他的史学原理: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思维框架和认知结构。

(一)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是一种研究(research)或探究(inquiry)”。^②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史学思想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 *historia* 这个词就是“探究”和“研究”的意思,也就预示着历史学在原初的时刻就等同于——门科学。我们还知道, *science* 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往往就是指自然科学,或者说精确科学或实验科学。历史学要想成为——门科学,往往也就是依照这个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构思的科学,比如说实证主义史学。但是,这恰恰是柯林武德要加以反驳的史学观念,他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其同一的地方,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门科学,是认为历史学是——门有组织的系统科学,德语世界的 *Wissenschaft* 这个词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达历史学这门科学。

柯林武德还进一步指出,历史学作为——门科学,“就是提出问题并试图做出答案所依靠的那种思想形式”。首先,这正是柯林武德在考古学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问答逻辑”,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命题逻辑”。其次,这也跟柯林武德强调史学的“认识论转向”有关,历史认知主体的心灵或大脑不是一面物理学意义上的镜子,不可能客观地映射历史认知的客体,但这并非一种历史怀疑主义,主体性并非一定导致主观性,因为当历史认识的主体从被动语态转到主动语态,反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历史研究过程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历史学家不断地重写历史。由此可见,历史学家研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客观存在的年代,真正的历史知识要从提问开始,然后通过过去遗留下的证据做出回答。但在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应从收集材料开始,把材料收集完之后,再进行研究。柯林武德则认为,我们在收集材料的那一刻起,已经隐含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可能在一开始,我们对自己的问题是自发的,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还不够自觉,但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找材料,而

①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H. Dray and W. J. Van Der Duss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45.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第10页。

是带着某种意图来找材料,任何意义上“竭泽而渔”式的收集材料都隐含着认知主体所设定的“认知框架”。再者,关于“问答逻辑”,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那里。苏格拉底常常称自己是一位“灵魂助产士”,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广场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其方式就是不断地提问,不断地追问问题的前提和条件,最后逼出那个最后的答案“认识你自己。”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这个话题,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二部分的计划。这个话题可谓贯穿柯林武德整个历史哲学的一条主线。柯林武德是从历史思维的层面来加以论证的,某种意义上跟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也是一致的,他倾向于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此外,柯林武德之所以将他的历史哲学命名为“史学原理”,某种意义上有着与罗素的《数学原理》争胜的意味。“II. 1、历史学与自然科学。A、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不可化约的: A1、历史学不能化约为自然科学; A2、自然科学不应化约为历史学。B、它们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它依赖于‘事实’和‘原则’,即某人观察到某个事物并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思考的历史事实。”^①

(二) 历史学的对象 “*res gestae* [活动事迹]: 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 “历史学是关于 *res gestae* [活动事迹] 的科学,即企图回答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的问题”。^②

关于“历史学的对象”这个主题,恰好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一部分的第二章节的计划。在实际的写作中,柯林武德用了“行动”和“自然与行动”两个章节的内容来刻画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柯林武德并没有称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要研究人们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也是他认为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件”,总是有一个外在的观察者的角度去观看这个事件,而历史学意义上的“行动”,则多了一层内在的思想层面,也就是“意向性”的内涵,也就需要有一个重演和理解的维度在里面,而不只是外在的观察和因果解释。

此外,柯林武德还先天地规定行动是“人类”在过去所做的行为,规定也即是否定,由此也就否定了“神”的所作所为,也否定了生物学意义上“动物”的所作所为。基于“人类”的行动总是朝向某种目的而做出的行为,这里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历史行动者所做出的行为,从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柯林武德先天地规定了历史学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柯林武德在“自然与行动”这一章节特别讨论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涉及的自由问题,但却是在“历史思维”的自律性的论证过程中推论出人类的理性活动是一项自由的事业。他所说的历史学的知识论与历史的形而上学之间具有同一性。(a) 历史思想不受自然科学的支配,并且是一门自律的科学;(b) 理性行动不受大自然的支配,而是以它自己的设计和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人类事务、*Res Gestae* [活动事迹] 的世界;(c) 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③

(三) 历史学的方法 “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 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的就叫作文献的东西的总称”, “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④

关于“历史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一部分第一章的内容(这一章节被诺克斯编入《历史的观念》的“后论”)。我们知道,职业历史学家对史学方法进行过很多经验性的归纳和总结,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方法无非就是收集文献和考证文献,进而得出历史事实,最后再归纳概括出

①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 245 - 246.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第10页。

③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101.

④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第11页。

历史的规律。但是柯林武德在“证据”这一章节中曾戏称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有可能流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堆积史料)或“鸽子笼式的历史学”(以论代史),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历史思维”的自律性。在柯林武德看来,既然历史学是一门问答科学,问题与证据总是相互关联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痕迹(trace)不仅是书面的,而且还包括非书面的考古遗迹,都可以成为证明某一问题的潜在证据。就像科学家不断地地质问大自然一样,历史学家也要不断地地质问任何上手的史料,将其转化成历史推论的现实证据。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并不是要复原过去的本来面目,而是从上手的历史证据中回答历史学家心中所设定的问题。在柯林武德看来,过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的历史实在。由此而言,历史实在论不过是一种历史时间“空间化”的隐喻表达。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过去只是我们通过过去在当下的痕迹而建构出来的过去,而且,这种建构的过去是一种开放的过去,能够给未来的重新建构提供某种自由的空间。借用美国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的一句话来说,过去只是我们的“本体论承诺”,比如说,如果我们去追问华盛顿是否存在这样的本体论问题,我们并不能先天地假定华盛顿是存在的,然后再去收集相关的历史材料去证明华盛顿的存在性,而是通过将我们上手的材料转换为证明华盛顿存在的证据,当现有的证据能够否定华盛顿不存在的疑问,或者说华盛顿不存在的概率是零,由此也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暂且相信华盛顿是存在的,华盛顿的存在状态只是我们的本体论承诺而已。由此,这也启示我们,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这样一种美德,即敢于承认历史的“不完全性”,历史知识往往就是上手证据迫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的“信念之网”。换言之,历史学家不能欺骗读者说自己能够复原所谓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以“历史代言人”自居。由此,历史知识才会随着时代和问题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获得重写,就像我们对未来的期待那样,我们应该对过去同样有一种开放的态度。

(四) 历史学的价值 “历史学‘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成其为一个人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的人是什么”。^①

关于“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可以对应“史学原理”第一部分的第四章的计划。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作为心灵的自我认识。在这里,历史学的价值既不是“资政”,也不是“育人”,但似乎又在逻辑上隐含着历史学既可以“资政”,又可以“育人”。这一观点看起来有点唯心论,乃至唯我论的色彩。实际上,柯林武德提到了历史学作为自我认识相互依存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作为一般的人,第二个是作为特殊的人,第三个是作为个体的人。从第三个层次来看,柯林武德已经改造了古希腊的这个“认识你自己”,在其中加入了历史性的维度。我们知道,古希腊哲人所谓的“认识你自己”,往往是认识这个永恒的自我,这个自我的同一性是不变的,带有实质主义的陷阱,而柯林武德认为的“自我”是不断变化的和不断创造的历史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去就是一个他者,只有通过当前的自我与过去的他者进行一个比较和对照,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如果没有过去或他者这个维度,可能就没有所谓的自我了。而且,从第一个层次来看,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也存在某种同一性,这也就是说,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只有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通约性,我们才能得出普通的或一般的人。但这个一般的人不是无差别的人,而是有差别的人,也就是历史的人。有差别,才意味着变化,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第11页。

意味着发展或进步的可能性,但这种差别又是可通约的差别,而不是绝对的差别,因为绝对的差别意味着没有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总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变与不变的统一体,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绝对的变不是历史,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皆流”,绝对的不变也同样不是历史,就像芝诺所论证的“飞矢不动”。换言之,中文的“沿革”或“损益”这些语词恰好能够表达历史的本质内涵,“沿”就是延续,“革”就是变革,历史既有延续的层面,也有革新的层面。

此外,关于“历史学的价值”这个问题,也应该对应于“史学原理”第三部分的计划。柯林武德提出在这个部分要讨论历史思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学是对理论和实践之间传统区别的否定。这种区别取决于——作为我们知识的典型事例——对自然的沉思,在那里,对象是预先设定的。而在历史学这里,对象是构造出来的,因此,它根本不是对象。如果历史是精心构造出来的,那么就很容易地理解一个历史道德和历史文明的特征,与我们的‘科学’道德和‘科学’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一个科学的道德将从人的本性是一种需要征服或服从的东西这一观点出发,一个历史的道德将否认存在这样的东西,并将我们是什么转化为我们做了什么”。^①由此,从历史性的角度出发,“是什么”就等于“做了什么”。这句话同样可以在维柯“真理等同于创造”的意义上理解,“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②

总而言之,虽然柯林武德生前未能完成“史学原理”这部大书,但借助于柯林武德整体著述中的“思想网络”,我们仍然能够重演和重构这部大书的关键内涵。就如大卫·布彻在《柯林武德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一书中所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体系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和短期的规划之分。短期的规划就是从早期的“历史哲学讲稿”(1926)到《史学原理》(1939),长期的规划则是从早期的“道德哲学讲稿”(1921)到《新利维坦》(1942)。在这个长期的规划中,布彻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在理论理性上的困境将会在实践理性的层面得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亲缘总是浓缩到历史学与哲学的关联,事实上,对于柯林武德来说,历史学提供了一把克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钥匙。”^③由此可见,柯林武德的“史学原理”不仅是一部“历史理性批判”,而且是一部“道德理性批判”。“史学原理”第三部分的规划将在“新利维坦”中得到实现。

三

“物转星移”(Eppur si Muove)柯林武德曾在《史学原理》中引用伽利略的这句名言,以此来阐述他的历史主义思想,他同样在《自传》中多次提到,他关于历史学的理解和看法并不是一个终极的观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中期报告”。由此,我们可以说,柯林武德终其一生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反思和批判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实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从而倡导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为后世留下了重新思考“历史学是什么”的史学理论遗产。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柯林武德的“史学原理”是基于他自身的历史经验所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或

①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101.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第11页。

③ David Bouche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 G. Collingw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1.

者说基于19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史学理论,所以说,他的这部“史学原理”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惑。总体而言,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观点,属于典型的西欧现代主义风格,他关于“科学历史学”的论述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色彩。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人们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主要强调历史学中的理性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则要凸显历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他们认为地球现在处于“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新阶段,开始的起点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人类逐渐在自然世界处于主导地位,这个概念也引发了很多人文学者的讨论,那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也就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个新术语,而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下兴起的情感史、动物史这样的史学实践,无疑也在挑战着他的“史学原理”。

进一步而言,在柯林武德试图将他构造的“史学原理”与具体时空的历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将其开端定向在希腊的希罗多德身上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当今全球史学史的写作和实践告诉我们,柯林武德关于世界史学的论述已不合时宜。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跨文化比较史学的若干理论分析》一文中,吕森明确提出要避免把西方历史思想的文化传统作为比较的基础,并进一步分析了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框架问题。作为理论框架,首先要找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以及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在吕森看来,欧洲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学并不能充当这样的理想类型或范式,他认为“历史意识”和“文化记忆”可以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类型。就此而言,柯林武德所构造的“科学历史学”的标准恰好是基于近代欧洲的史学实践和历史观念,而吕森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柯林武德设定的标准背后所隐含的“欧洲中心论”。吕森进一步提出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层来进行跨文化比较。在共时性方面,“应当考虑(a)有关历史叙述之文化实践的类型;(b)历史感知或意义的类型;(c)历史意识的状况;(d)历史意识的内在策略与运用;(e)历史感知的主题(topoi);(f)历史学的表现、媒介、种类及其形式;(g)历史定性的不同功能”。在历时性方面,“历史学最好运用一种与人类交往的主导性媒介相关的一般性历史分期。人们或许可以区分三个时代开始,它们分别由三种媒介规定:口述性、书写性和‘电子性’”。^①一方面,吕森基于人类交往的主导性媒介所提出的历史分期突破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分期模式,适应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新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吕森所构造的跨文化比较的类型也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最新成果,突破了近代西欧“科学历史学”的藩篱,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框架仍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

换言之,历史研究的实践永远在路上,人们对于史学实践的理论反思也同样是在通往未来的路上。在此意义上,“史学原理”仍然是一部不断生成和改写的大书。

(作者顾晓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邮编:510275)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Jörn Rüsen, "Som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5, No. 4, Theme Issue 35: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 1996, pp. 5-22.